

宋辽金元坊刻家刻本

李红英

宋代刻本

雕版印刷术的发明，给我国古代文化的广泛传播拓展了无穷的想象空间。经过唐、五代的发展，到两宋时期，雕版印刷技术也由萌芽逐渐走向成熟，雕版印刷得到了广泛应用。宋元时期，随着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生活的日益多样化，雕版印刷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，官府、坊肆、私家竞相刻书，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。刻书业几乎遍布全国，其中，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，逐渐形成以浙江杭州、四川眉山、福建建阳、山西平水等几个刻书中心。刻书的品种众多，涉及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典籍。由于刻书目的、主旨不同，官刻、坊刻、家刻三种刻本内容也不尽相同，各有侧重。官府刻书以儒家经典为主，兼及历朝正史、诸子、医书、字书、类书和名家诗文以及佛、道两家经典等。私家刻书以文集为主，传播学术。书坊刻书以出售营利为导向，种类繁多，形式多样，主要刻印一些销路好、适合广大民众口味的书籍，涉及儒家经典、童蒙字书、科举应考程文等相关内容。两宋繁荣兴盛的刻书事业，对后世文化的广泛传播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宋刻本传世不多，北宋刻本更为珍稀，是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。

宋代坊刻本

坊肆，即民间刊刻、印刷并出售书籍的地方，以营利为目的。又称书肆、书林、书堂、书棚、书铺、书籍铺、经籍铺等，泛称书坊。坊刻本即书坊主刻印之书。通常书坊雇有写工、刻工、印工等。坊肆刻书起源最早，唐代印刷术发展以来，坊肆刻书日益兴盛，入宋后更为普遍，一些书肆有几代人相继传承者。宋代坊刻遍布全国，以浙江、福建、江西、四川等几个地区的书坊刻书最为活跃，所刻多为经史百家、唐宋名家诗文，科举程文及民间实用书。最著名的宋代有临安陈氏书籍铺、荣六郎书籍铺，建安尹家书籍铺、余仁仲万卷堂、建安黄善夫家塾、建宁黄三八郎书籍铺等。其中，建安黄善夫家塾刻本，一般认为是家刻本。然黄善夫刻《史记》虽版刻精美，其校勘之粗率，出乎意料，当是坊刻本。

书坊主人多不见史传，除陈、余两家略可考证外，其余诸家坊肆，只能从传本和各家书目记载或藏书家题识中见到。一般认为坊刻本目的在于速成营利，不注重校勘，质量不高，其实并不尽然。现存坊刻本中仍不乏刊刻精品之作。如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所刻《唐女郎鱼

李红英，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。

玄机诗》、《周贺诗集》；建安黄善夫刻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；建安余仁仲万卷堂刻《春秋公羊经传解诂》等，堪称宋代坊刻本中之精品。

南宋时，四川地区刻印了一系列唐人诗文别集，数量较多，世称蜀刻唐人集。传世各集可分两个系统：一为十一行本，皆半叶十一行，行二十字，白口，左右双边，约刻于南北宋之际，今存《骆宾王文集》、《李太白文集》、《王摩诘文集》三种；一为十二行本，皆半叶十二行，行二十一字，白口，左右双边，今存《孟浩然诗集》、《刘文房集》、《陆宣公文集》、《昌黎先生文集》、《刘梦得文集》、《张文昌文集》、《皇甫持正文集》、《欧阳行周文集》、《新刊元微之文集》、《杜荀鹤文集》、《孟东野文集》、《新刊权载之文集》等十九种。各书楮墨精良，藏书家皆珍视之。从其“新刊”之类书名来看，应该都是坊刻，而非官刻、家刻。今各书均钤有元代“翰林国史院官书”长方朱印，明清两代藏内府。清康熙时，刘体仁等取之内库，此书始流传民间，今存本多有“刘体仁印”、“颍川榴考功臧书印”等印。

宋代家刻本

家刻本，即私人出资或主持刊印的书籍。私人出资刻书，主要出于传播学术的目的，数量远不如官刻、坊刻之多；加上刊刻人校勘精审、精雕细刻，故家刻本历来颇受推崇。宋代私家刻书最著名者，如庆元二年（1196）吉安周必大刻《欧阳文忠公集》，嘉泰元年（1201）周必大刻《文苑英华》；廖莹中世綵堂刻《昌黎先生集》、《河东先生集》，纸莹墨润，令人赏心悦目，堪称宋版书中之上品，都是有名的私宅刻本。

辽、金、蒙古刻本

当时与两宋并存的少数民族政权主要有辽、金、蒙古，受中原文化的影响，刻书事业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。契丹族建立的辽很重视佛教，注意吸收中原文化。除大量刻印佛经外，也印刷儒家经典、各类史书、诗文集及各种工具书。辽代印刷业最发达的是燕京、范阳以及河北、山西北部一带。当时燕京已有多家书肆。辽代刻书传世已寥如星凤，有关文字记载亦甚少。目前见到的辽代刻本是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的，以山西省应县木塔文物管理所存《契丹藏》、《蒙求》等为代表，极其珍贵。

金代统治者虽以武力称雄，但也颇为重视文化，其刻书事业相当发达。金灭北宋时，将汴梁的书肆和北宋政府三馆文籍图书、国子监书版以及一部分雕版工人一并掠去，迁往金代刻书业的中心平阳府，即平水，今山西临汾一带。平水不仅官方设有刻书机构，主持刻书，私家和书坊刻书也很多。私刻多经史文集，坊刻多医书、类书及说唱诸宫调，为金代刻书业集中之地。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，较著名的有《崇庆新雕改并五音集韵》、《南丰曾子固先生集》、《萧闲老人明秀集注》、《刘知远诸宫调》等，基本上都是坊刻。

1207 年铁木真统一蒙古，建立“蒙古汗国”。1260 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，1271 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，这一期间为蒙古时期。受宋、辽、金等地刻书事业的影响，蒙古时期的刻书事业也日益兴盛。蒙古太宗八年（1236）已经在平阳设置经籍所刻书。现存有代表性的坊刻本有蒙古定宗四年（1249）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所刻《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》；家刻本主要有蒙古宪宗六年（1256）北京地区赵衍刊刻的《歌诗篇》。

元代刻本

1271 年，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，建立元朝。为了巩固蒙古族政权在全国的统治，元朝统治者非常注重吸收汉族文化。上承宋金传统，政府重视刻书，官府与民间刻书业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。与两宋相比，刻书地区更为普遍。浙江、江西刻书业很发达。元代的杭州地区，把原先南宋的国子监改成了西湖书院，继续负责刊刻经史群书，形成元浙本系统。官刻书多奉诏下杭州刻版。其他地区仍以福建建阳和山西平水为最繁荣，形成麻沙、平阳两个刻书中心。江南、江东、湖广各地在刻书方面也有所发展。元世祖将经籍所从平阳迁大都之后，北京刻书业随之兴盛。元代刻书仍以当时士大夫诵读必需的经、史为多，诸子书、类书以及新编农书、医书、科举用书等刻印量均很大。在南方，经过宋元之交战争的剧烈毁坏，眉山这个刻书中心，已经不复存在。

元刻本特点是字体多仿赵体，即当时最流行的大书法家赵孟頫的字。字多简化、俗体字，不避讳，行格渐密，由左右双栏渐向四周双栏发展，目录和文内篇名上常刻有鱼尾，版心多作黑口。

元代坊刻本

元代刻书基本上延续前代。坊肆刻书比官刻、家刻数量多、规模更大，流传较为广泛。各地都有书坊，以平水、建阳最为集中，或延请名家校订，有不少精槧佳刻。福建建宁府沿袭南宋刻书风气一直发展下来，仍然是书坊聚居之地，刻书最多，建阳、建安尤为出名。如余氏勤有堂刻《国朝名臣事略》、刘氏日新堂刻《伯生续诗集》、宗文堂刻《静修先生文集》、虞氏务本堂刻《赵子昂诗集》等，刊刻精良，皆当时著名书坊所刻重要典籍。建阳书坊中有些书籍铺不仅自己刻书，有时也承接官方刻书。如余志安刻《四书通》，是当时名儒胡炳文的著作。从书后张存中跋语可知此书是浙江儒学委托建阳书坊刊印的。杭州地区的书棚本等比较精美的坊刻在入元后已经消歇。现存的只有杭州中瓦子张家书铺刊印的说经话本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》、《大唐三藏取经记》等，其字体接近宋浙本，是元代杭州地区的坊刻。元平水本现存有曹氏进德斋刻《尔雅》、《中州集》等。元代坊刻涉及经学、诸子、医药、文集、通俗读物等各类书籍。

元代家刻本

在政府刻书风气影响之下，元代私家刻书比宋代有了更大发展。私人刻书家增加，书籍刻印品种齐全，质量提高。《书林清话》收录元代私人刻书就有四十余家。现存著称于世者，有今浙江淳安邵桂子编刻的《邵氏世谱》、今江苏松江叶曾南阜书堂刊刻的《东坡乐府》。又如岳氏荆溪家塾刻九经三传、吉安王常刻《王荆公诗笺注》、东平丁思敬刻《元丰类稿》等，皆镌刻极工，不下于宋版，为元代私人刻书中的典范。

元代私家刻书中，有些历史相当悠久，绵延近百年。